

壹、前言

Ogburn and Nimkoff (1955) 曾發函給十八位對家庭有研究的社會學家，請其列出美國家庭所發生的重大變遷。朱岑樓（一九八一）採用類似的方法，詢問一五二位專家有關我國近六十年家庭發生的重大變遷。如果這個主題在今日再做，不知會得到那一些的重要發現。不過，可以預測的變化應包含「女性地位愈來愈高」這一項。某些討論趨勢的學者已注意到「女性在社會上扮演更廣泛、更重要角色」的事實，並認為這趨勢可能成為社會的主流。

以政治領袖的性別來看，我國的副總統是女性，鄰近菲律賓和印尼都是由女性做總統。近日美國的媒體在預測二〇〇八年的總統大選也許是兩位女性在競逐，最可能是共和黨的現任國家安全顧問

為什麼沒有男性福利服務？

彭懷真

萊斯和民主黨的現任參議員希拉蕊。或許，二〇〇九年初全球最有權力的人是位女性。

在商場、在非營利組織、在學術機構、在各行各業，女性紛紛擔任要職，表現出色者非常多。社會各場域，女性的貢獻與影響力，有目共睹。相對的，男性的重要性正在下降，男性的角色已大不如前。不論整體的男性狀況如何，至少有部分的男性處境逐漸困難，正有龐大的男性人口加入一般人心中「弱勢人口群」的行列，例如：失業者、失婚者、有意但無力成婚者、家庭破碎者、邊緣青少年、遊民、出獄者、弱智者、精神病患、貧民、身心障礙者、原住民、外勞等。我們固然不應「污名化」這些人口群，但不能否認其中有不少是需要福利服務的。

貳、男性弱勢人口群為數可觀

與社會福利的相關問題之中，婦女福利的議題與照顧責任、勞動市場、住宅政策、醫療制度、外籍勞工等都有關，但這些議題只有女性有關嗎？當然不是！男性也需要面對這些問題，部分弱勢的男性，在獲得及爭取資源的能力有限下，同樣面對不少困難，在這些福利議題方面也有需求。

在社會工作專業處遇的範圍中，家庭暴力、性侵害、性交易等事件產生了許多受害受創者，有少部分是男性。破碎家庭、單親家庭不一定只有婦女需要關懷。有托育需求的，也包括父親。在家庭婚姻的領域中，面對婚姻危機的，也包括丈夫。經歷喪偶痛苦的，不只是有女人。要照顧另一半及子女的，不一定是婦女。晚景淒涼的，不只是老太太……。許多男性也承擔強大的壓力、經歷各種的痛苦。

但各種福利服務輸送系統不一定能接觸到這些人，他們也常常不是福利服務的目標人口群。當討論相關議題的時候，他們彷彿不存在似的，像幽靈人口。在公部門，沒有男性福利政策、沒有男性福利科、沒有男性福利服務中心，甚至對此議題的討論也非常有限。學術領域裡，少有「男性福利服務」的論述；在人們行動的空間中，女性空間被擠壓的問題頗受重視，「弱勢男性」的空間卻少有人注意。在網路的虛擬空間中，女性網站受到重視，但是男性的網站卻很有限，少部分還可能給人不當的聯想。

做為總人口的半數，女性所處的困境、所居的劣勢、所面對的不利勞動條件和被歧視的就業環境，的確都很嚴重。在家庭裡、在

社會上、在生兒育女的負擔方面，女性常遭不公平的對待。但是，我們不能說：這些問題只有女性才會經歷、這些困難只屬於女性。必然有為數龐大的男性也是弱勢人口，也需要福利服務，但在學術界、實務界、行政者，相關的探討非常少。如果性別研究等於婦女研究，婦女權益是性別權益的唯一內容，婦女福利被關切，男性福利卻沒有人注意，這總是不完整的。

近年關於性別和其他社會議題，或是福利議題結合時，有不少兩分法的情況。Murdock (1945) 指出：在不同的社會中，有共同的部分可稱為「文化普遍性」(cultural universal)，不同的文化確實也有習於將現象兩分的現象。當然每個分類各有依據，包括在性別方面的，但可能正因為太明確地切割，或是造成刻板化印象，或是因被錯誤歸類，而造成了某些男性的邊緣人。例如：

- 家庭中，父權意識型態固然十分普遍，但沒有權力的男性也不在少數。家庭中因夫權過高而產生許多問題，但妻權過高，欠缺平權的情形，也的確存在。
- 女性被剝削和被控制的情況非常嚴重，但不代表男性就沒有被剝削的情形，不論他是被男性或女性欺壓。
- 無分公領域及私領域，女性都有被壓迫的壓力，也常有無力感，但在公私領域被壓迫的男性就被忽略。
- 無數女性經歷了痛苦和羞辱，因性別而被歧視，但男性中也有經歷痛苦和羞辱的，也有因性別而痛苦的。

站在人道主義的角度，女性的困境實在需要全面的了解及協

助，這是女性主義、婦女福利服務、女權運動已經長期努力了，也有一些成果了。不過，這不表示所有男性就沒有困境，就不需要有一些關於男性困境的討論以及福利服務，在性別理論的辯證中，男性議題顯然不及女性。許多男性也應被注意、被關懷，不一定要有男性主義、男權運動，但男性福利服務是該被討論的。

參、男性研究中一個被忽略的主題

「在人們聲討父權對女性的種種束縛與壓迫時，發現不僅僅是女性受制於呆板單一的性別角色，男性也同樣是父權制的受害者，原本豐富多樣的男性特質被『高大威猛』的男性形象所扭曲、闡割以致狹隘平面化。」（周華山，一九九九；姜振華，二〇〇二）依此觀察，不符合「高大威猛」的形象，甚至表現與此相反的弱勢男性，必然更為困窘，是與女性另一種不同的悲劇，尤其是在福利服務方面有高度需求的男性。至少這種現象應是「男性研究」中一個主題。

自一九九〇年代起蓬勃發展的男性研究有一些主題較被注意。包括男性反暴力及性別歧視（*Mainly Men Against Violence and Sexism*）、男性終止暴力（*Men Stop Violence*）、男性反色情（*Men Against Pornography*）、男性需求改變（*Men for Change*）等均是男

性研究的重點，這些領域均有專門的網站。在分析之中，「性別」是核心，但「福利」或「福利服務」則乏人注意。西方的男性研究著重父性父職，男性從事女人的工作，男性在婦女解放運動中的參與，男性氣概、男性性取向等議題（王雅各主編，二〇〇一）。對福利議題則少有觸及，依二〇〇三年二月十二日對google網頁查詢，與「男性福利」有關的只有一項，是香港的一個團體呼籲成立男性聯盟，爭取「男性福利」。與「弱勢男性」有關的則有二十項，其中有討論老兵、娶外籍新娘的、適婚年齡不易成婚的等三種人口群，但未廣泛處理弱勢男性的普遍困境。

Messner（1992）認為性別應從三個角度加以分析：一、做為一種社會互動（如日常生活展示、表演與互動的實踐成果）；二、做為一種結構（如何制度化形成了勞動力與權力的分化）；三、做為一種文化（包括性別意象、象徵、意識型態、資源等）。但是以「福利服務」為主題的討論，非常稀少。我們從各種統計中發現男人普遍比女人：活得短、工作長、車禍多、意外多、壓力大、挫折多、精神疾病多，這其中必然與社會互動、結構、文化等有關，但在處理這些問題較被忽略，尤其是與福利議題範圍相關者，不被重視。

福利服務的主要服務對象為何？多數人的認知是「弱勢人口群」。雖然此種觀念具有「殘補式」的假定，終究還是符合多數人的想法。若以性別來區分，女性較容易被想像是「弱勢」，男性則非弱勢。但男性若是因其他條件（如所得、身心狀況、就業情形等）被

歸類為弱勢，其困境與女性必然不同，外界對這些男性的處理和這些人對自己的看法，也與女性有異。

肆、「男卑」的邊緣人壓力

社會學的研究注意到「邊緣人」(marginal man)現象。Robert Park 提出此概念，他認為在社會中的某些特質正常地是彼此結合的，但有些人只具有其中一部分的優勢，但在另一些是弱勢的，則屬邊緣人。該詞也可指參與兩個不同文化團體而產生左右為難或心理衝突狀態的人，他並不完全認同某一標準，也不能完全參加某一團體。這兩個團體有某些衝突的價值或規範，讓人無所適從(彭懷真等譯，一九九一)。例如，女性勞工的平均工資是男性的三分之二，這是一種不平等。但這也顯示：男性勞工們的所得差距比女性要大，低薪資男性的相對剝奪感(relative deprivation)也許較女性更為強烈。

依此概念，男尊或女卑不屬邊緣人，但男卑則是。女性被排除在關鍵的生產角色外較常見，但男性被排除在生產角色之外則容易有邊緣人的壓力。身為家中主要生計來源的男主人，失業或在就業市場中被邊緣化的壓力特別大。在高齡化的社會中，扮演照顧者的男性也面對較多生心理及社會適應的狀況。在職場，男性的薪資與地位若遠低於女性，可能有較大的心理衝突。在政治權力的競逐中，

男性敗給男性較為普遍，但敗給女性者則多了「邊緣化的壓力」。在家庭中，女性做為照顧者較常見，男性做為照顧者則有邊緣人的角色認同問題。女性的「強迫性母職」(force motherhood)被研討和討論，但有沒有「強迫性父職」呢？女性「性奴役」(sexual slavery)一直是公眾關切的，但男性被「性奴役」的問題，較少人留意。

當女性被鼓勵要自我探索，要爭取自身權益，要追求自我成長，要和「姊姊妹妹一起站起來」之時，也有許多男性是無力自我探索，無法爭取權益，不知如何站起來的。當女性參與各種團體工作坊反省自身性別角色的位置與處境之時，為男性所辦、鼓勵男性參加的類似活動卻少之又少。當各種成長團體討論「女性意識」時，「男性意識」能否成為一個議題？女性當然需要覺醒(awaken)，男性就一定不需要嗎？王雅各(一九九四)指明：女性意識的高漲和女性主義經由女性努力所顯現出的成果，都表示女權已然成了二十世紀最強勢的思潮和風潮。婚姻家庭的研究領域中，女性主義更是很重要的聲音。不過，在二十一世紀，關於男性的困境，是否也該有些論述？

在「兩性工作平等法」執行一年時，大家必然對職場中的性別平等議題有更多檢視，包括對男性是否能在一個友善的工作場所中發揮所長，免除就業方面的歧視。若是男性在職場上明顯居劣勢，對當事人不利，對他的家庭及子女也不利。這個問題，顯然被忽略，也將形成代間傳遞的惡果。

從Blau and Duncan(一九六七)進行代間社會階層化(social

stratification) 的研究起，多項研究均說明父親的教育、收入、職業地位、生產工具的擁有狀況對子女的教育、第一個工作、職業地位、收入等是有影響的。(許嘉猷，一九八六)若是父親在社會競爭中居劣勢，是有可能迫使下一代在生涯發展中不利，甚至形成貧窮的代間循環問題。若在社會裡，教育是社會流動最重要的管道，子女是可能因父親就業不順而教育機會的欠缺，進而繼續居社會低階級。

伍、男性會尋求協助嗎？

當然，如果真的規畫了男性福利服務，不論是救助、設施或機構，男性是否會積極地使用，也不無問題。男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對於求助與求援的訓練顯然是不足的。對於加入某種網路時的被標籤過程中，既不習慣，也可能抗拒。他擔心自己除了弱勢之外，另外加上某些可怕的標籤，如「輸家」、「失敗者」。為了抗拒即使只是很短暫很微小的不愉快，好些男性孤獨地生活著，抗拒接受服務。所以，即便有好些社會機制不拒絕男性的案主，包括一些婦女福利服務中心和家暴性侵害中心也接納男性，但男性求助者可能仍然有限。

性別研究中的「關係中的自我 (self-in-relation)」概念或可提供某種線索 (Jacob, 2000; 劉珠利, 二〇〇〇)。女性常在關係網之

中才可能呈獻自我，女性被鼓勵加入人際互動中，在其中成長及發展。許多婦女福利服務也透過此種機制去協助女性，先邀請女性加入某種幫助的網絡之中，如成長團體、受害者自助團體，先獲得支持，再共同倡導及訴求，進而成為社會運動的參與者等。但男性則或是選擇孤獨 (愈是欠缺競爭力者愈不願露臉)，或是加入同樣弱勢的男性人口群 (所謂的酒肉朋友、狐群狗黨)，真正能採取較建設性的，仍屬有限。

畢恒達 (一九九九) 分析：要男人有所改變，要他們知道：一、有改變的可能；二、有動機去改變；三、知道改變的方法。不要從道德訴求入手，而從個人興趣入手比較好。不過，已居於弱勢又長期為生活所困的男性是否有足夠的意願去尋求社會資源以利改變，又是否知道改變的方法與途徑，不無疑問。更殘酷的問題還有：有改變的可能嗎？改的結果會如何？是否會改的很好呢？

對於弱勢女性的改變，諸多專業已做了很多努力，各種婦女福利大致塑造出一些正面的形象。但對弱勢男性的突破，會如何呢？這個議題顯然還欠缺人們注意。社會工作的領域是否該對此稍加注意，有些討論呢？

(本文作者現任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 參考文獻：

王雅各 (一九九四)。變遷中的男性角色意識與婚姻觀念，收錄在救

國團社會學研究所編印，與全球同步跨越世紀系列研討會實錄（下），臺北：救國團社會研究院，頁九一一九八。

王雅各（二〇〇一）。男性研究，臺北：五南。

王麗容（一九九五）。婦女與社會政策，臺北：巨流。

臺北市府新聞處（二〇〇二）。臺北女人空間專刊，臺北畫刊，四一〇期。

朱岑樓（一九八一）。中國家庭組織的演變，收錄在朱岑樓主編：我國社會的變遷與發展，臺北：東大，頁二五五二二八七。

朱岑樓主編，彭懷真等譯（一九九一）。社會學辭典，臺北：五南。

周華山（一九九九）。閱讀性別，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姜振華（二〇〇二）。解讀女男，二十一世紀，網路出版第五期。

教育部（二〇〇〇）。兩性平等教育季刊，第十一期，男性研究。

畢恒達（一九九九）。美國男性研究學會第八屆年會報導，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第五四期，第五〇一五五頁。

許嘉猷（一九八六）。社會階層化與社會流動，臺北：三民。

彭懷真（一九九四）。性別角色與現代化的問題。發表在世界教育課程與教學會議亞太區年會。高雄：高雄醫學院。

劉珠利（二〇〇〇）。貶低——一個該被貶低的特質？社會工作學刊，第五期，頁七七一一〇〇。

Blau, Peter and Otis Duncan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Wiley.

Jacob, J. L. (2000). The Spiritual Self-in Relation: Empath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ity Among Modern Descendants of the Spanish Crypto-Jews.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39(1), pp.53-63.

Michael Messner (1992). Power at play: Sports and the problem of masculinity .Boston: Beacon Press.

Mnrdock, George P. (1945). The Common Denominator of Culture. The Science of Man in the World Crisis, edited by Palph Lint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Ogburn, W. F. and M. F. Nimkoff (1955). Technology and the Changing Family. Boston: Hongton Mifflin Company.